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论文

试论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理论 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关系

福州军区司令部 龚忠祥 吴昌德

一九八三年十月 北京

〔第 17号论文〕

试论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理论 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关系

福州军区司令部 龚忠祥 吴昌德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形成，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具体问题的产物，同时也是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遗产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提出，都是在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可能只凭某些天才人物的“灵感”臆想出来。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涌现过许许多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理论家和善于治军带兵的著名将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遗产相当丰富。其内容涉及到与战争和军队建设有关的各个方面，也包括如何认识和处理战争与政治、军事与政治、官长与士兵、军队与民众、我军

与敌军关系等属于军队政治工作范畴的内容。只要有意识地浏览一下我国古代的各种典籍就会发现，不仅象《孙子兵法》、《六韬》等军事理论专著中有关于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论述，而且在《史记》、《汉书》等史书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艺书中，也都有很多这方面的生动记载和描述。

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学习继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思想文化遗产。他在青年时期就很明确地主张，学习要广汇百家之流，对历史遗产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他把“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规定为我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本人身体力行，是学习继承中国古代优秀遗产的光辉典范。他广泛涉猎中国古代的各种典籍，对古代著名军事人物、战争战例和其他军事遗产相当熟悉。在他的军事著作和有关军事问题的讲话中，常常自然而贴切地广泛引用古代兵法和战例来论证自己的军事思想观点。他在提出和论述我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理论原则时，也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遗产中摄取了丰富的养料。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理论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的内容相当丰富，对古代军事思想的批判继承也是多方面的。现仅就以下四个方面，对其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批判继承关系作一个初步的考察：

一、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阐明了战争与政治、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论证了政治工作在军队建设中的首要地位，明确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从毛泽东同志有关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理论原则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同时也吸取了古代军事思想遗产中的有关思想材料。

中国古代军事家们，虽然没有提出和使用“军队政治工作”这个概念，但是，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在战争和治军实践中，都程度不同地认识到政治因素对战争胜负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影响。春秋中期著名的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国军事家曹刿注重民心向背和士气高低等政治因素，战前做好取信于民的政治准备，战争中使用“一鼓作气”的战法，表明他对政治因素对争取战争胜利和增强军队战斗力

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活动于春秋末期的兵家鼻祖孙武，深刻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他在论述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时，把“道”这个属于政治工作范畴的因素列为“五事”之首，第一次把政治因素、政治工作摆到了战争问题和军队建设的首要位置。曹刿和孙武的上述思想观点，为历代军事家所注重和推崇。毛泽东同志对此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论著中，多次引用齐鲁长勺之战这个战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为了说明革命战争的战略防御原则，毛泽东同志全文引用了《左传》对长勺之战的叙述，并作了精辟分析。其中特别指明，除其他原则外，做好战前的政治准备工作和注重士气高低也是战略防御的两条重要原则。他说：“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这是毛泽东同志直接征引古代军事遗产来阐述军队政治工作地位作用的一个实证。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对《孙子兵法》是下过苦功夫钻研的，可说是熟记于心，运用自如。他在论述军队政治工作地位时虽然没有直接征引《孙子兵法》的言论，但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到其对孙武有关思想批判继承的痕迹。如毛泽东

同志一向把政治因素摆在战争和军队建设的首位，在《论持久战》中说：“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这与孙武把“道”摆在“五事”之首就有相通之处。当然，无论是曹刿还是孙武，对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都是带有朴素的感性经验性质，没有也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理论阐述。毛泽东同志则科学地论述了军队政治工作为什么重要，完成了从感性经验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军队政治工作主要应起什么作用，即其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提出，最根本的是一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性质；二要统一全体军民思想意志，搞好内外团结，做到同心同德，一致对敌。前者是我军所特有的。古代任何剥削阶级的军队都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后者则可以从古代军事思想中找到渊源。据《尚书》记载，周武王兴兵讨伐商纣王时，在战前誓师大会的动员讲话中，就特别强调了全军上下统一思想意志的重要性，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奋勇杀敌。记录这次著名动员讲话的《牧誓》中有这样几句话：“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①孙武讲的“道”也是要使全体

军民与国君和将帅意愿一致，做到上下同欲，即所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②荀子在《议兵篇》中所说的：

“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也是军民上下要同心同德的意思。秦汉以后的军事家们类似的论述就更多了。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政治工作对于争取战争胜利和搞好军队建设的重大作用时，充分地注意到统一全体军民思想意志的极端重要性。他在《论持久战》中说：“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使几万万人民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③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说：“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④这些论述，不仅命意与古代军事家们的有关言论相当接近，而且在语言形式上，也直接间接地改造和利用了古人的词句。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理论与古代军事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本质区别，在于用来统一军民意志的政治内容不同。一般地说，古代军事家出于他们剥削阶级的本性，总是要用反动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和封建迷信思想来统一军民的思想意志。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批判了那种反动的政治内容，旗帜鲜明

地提出，我们人民军队是要用马列主义科学世界观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统一大家的思想。

二、关于正确处理军队官兵关系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搞好军队内部官兵关系，实现官兵的团结一致，认为这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他说：“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⑤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优秀遗产是一脉相承的。历代有作为的军事家对于搞好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都十分重视。孙武、吴起和孙臆等大军事家，都把将帅与士卒之间能否团结一致，列为预见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孙子兵法·行军篇》中说：“卒未亲附而罚之不服，不服则难用也。”认为将帅如得不到士兵的拥护，连惩罚也不宜施行，更谈不上命令士兵去打仗。《孙臆兵法·将失篇》中，列举了数十种必然打败仗的原因，其中多数是由于将帅和士卒关系不协调所致。如“令不行，众不壹（团结统一）”、“下不服，众不为用”、“众恐”、“众疑”等。他们都明确地指出，只有正确处理官兵关

系，实现官兵团结一致，军队才有坚强的战斗力，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古代军事家的这些思想和经验材料，对毛泽东同志重视研究解决军队内部官兵关系的问题，应该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着搞好官兵关系，古代军事家们作了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办法。最集中最大量的，一是官长要爱护士兵；二是官长要与士兵同甘共苦。各种史籍都记载了很多有关这两方面的论述和事迹。毛泽东同志在解决官兵关系问题时，充分吸取了这些可贵思想遗产。他提出的“官兵一致”的原则，就包含了官长爱护士兵和与士兵同甘共苦这两方面的内容。

关于官长要爱护士兵的主张，古代最著名的是孙武所说的：“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⑥即只要将帅爱护士卒能象爱护自己的孩子那样，士卒就会跟随将帅赴汤蹈火，与将帅同生共死。孙武的“爱兵如子”思想为历代军事家所推崇。战国以来许多著名将领，都以此为带兵的准则，在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吴起当将领时注意爱护士兵，“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所以“尽能得士心”。士兵作战时都拚

命向前，死不后退。⑦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征战中，随行的一位士兵生病。李世民便亲自到床前探望，询问病情，并交待把这位士兵留下由当地州县负责治疗。使其他将士“莫不欣然愿从”。⑧毛泽东同志在阐述官兵一致原则时，一方面直接继承了古代军事思想中官长要爱护士兵的思想。如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在爱兵的具体表现形式上，也学习继承了古代军事家的可取之处。如长征路上，毛泽东同志把马让给生病的警卫战士骑，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盖在警卫战士身上等，都与古代军事家的爱兵形式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他又对古代军事家的爱兵思想进行了批判改造。古代军事家们把官兵关系看作是父子关系，提出“爱兵如子”。这是剥削阶级军队的官兵在政治上不平等的本质决定的。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军队的官长和士兵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官兵关系不是父子关系，而是革命同志关系，阶级兄弟关系。官长对士兵的爱护不能象旧军队那样，当作骗取士兵拚死作战，以取得胜利的一种手段，而应该建立在高度的阶级觉悟和真诚深厚的阶级感情基础上。因此，我军干部的爱兵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官长的爱

兵，就其阶级内容来说是有本质区别的。

关于官兵要同甘共苦的论述和事迹也大量见之于各种史籍。如《尉繚子·战威第四》中说：“勤劳之事，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国语·齐语》中说：“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疆。”还有《六韬·龙韬·励军》中所说：“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这些论述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即官长只有和士兵同甘苦，士兵才会和官长共患难。《史记》、《宋史》等史书在记叙王翦、李广、岳飞、戚继光等著名将领的生平业绩时，都讲到他们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事迹。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继承了这些思想精华。毛泽东同志把“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规定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列为官兵一致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军认真实行官兵生活同甘共苦的原则。官兵同吃红米饭，同穿粗布衣，同住茅草房，同分五分钱的伙食尾子。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带头坚持这一原则，不仅和战士同吃同住同战斗，而且和战士一起到几十里外的地

方挑粮上山。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曾指出，官兵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这是我军能保持团结一致，有绝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对照古代军事家的有关论述和事迹，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言论行动与古代军事思想有直接的联系。应该指出，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古代任何军队的绝大多数官长，都是不可能真正彻底地做到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他们的理论原则和实际情况是对不上号的。他们的“同甘共苦”具有很大的虚伪性。在一切旧军队里，官长剥削压迫士兵，甚至任意打杀士兵的现象是司空见惯，毫不足怪的。只有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新型人民军队里，官兵生活上同甘共苦的原则才能真正付诸实现。

三、关于正确处理军民关系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坚持战争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最伟大的源泉。人民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⑨因此，他十分重视搞好

军民团结，提出正确处理军队与民众关系必须实行军民一致的原则，并把这一原则规定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毛泽东同志说：“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⑩从马列主义科学理论和人民军队性质作用的高度来论证军队为什么必须和人民打成一片，把搞好军民关系的办法概括成“军民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的贡献。在中国古代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哪一位军事家有这样科学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不过，军民一致原则所包含的许多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则离不开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遗产的批判继承，完全可以从古代军事思想遗产中找到来源。

例如，“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这一思想及其用语，就是从中国古代军事遗产中继承下来的。“秋毫无犯”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汉王刘邦在肖何的再三引荐下，拜韩信为大将军。拜将仪式结束后，韩信分析了楚汉双方的形势，指出项羽由于残酷无道而失民心，接着说：“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

约法三章耳……”。刘邦自己也说过：“吾入关，秋毫无所取”。^⑪韩信和刘邦都认为，实行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获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战胜敌军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显然，毛泽东同志所说“秋毫无犯”的意思与古代军事家所说“秋毫无所害”的含意如出一辙。都是说军队纪律要非常严明，丝毫不得骚扰民众，损害民众的利益。

再从秋毫无犯民众纪律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来看。刘邦“秋毫无所取”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著名的“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去秦法”^⑫。这种“约法三章”的形式和内容具有简明扼要、易懂易记易行、便于检查的特点，表现了很强的生命力，受到了后人的推崇和仿效。宋代名将岳飞曾规定“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还提出“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口号。^⑬明太祖朱元璋在率兵攻打张士诚时，亲自誓词规定“三不准”：不准欺凌百姓；进城不准烧杀掳掠；不准挖掘当地人的坟墓。并写成戒约印发给官兵。^⑭在进攻元大都时，朱元璋又规定了“六不可”，即不可乱杀人；不可抢财物；不可毁坏居民；不可破坏农具；不可杀耕牛；不可掠人子女。^⑮毛泽东同志为我军规

定的“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开始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为大家所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难看出，这些规定不仅具体内容与古代军事思想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连表现形式和措词用语也与古代的“约法三章”、“六不可”何其相似。

毛泽东同志在群众纪律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继承了古代军事思想优秀遗产。但在执行群众纪律的办法上，他深刻批判并坚决反对古代军事家们那种靠严刑重罚来维护纪律的残酷作法，提出主要应采取加强教育提高觉悟的办法，使各项纪律、规定成为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

又如，军队开展对群众宣传工作的具体形式。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办法是，每到一地便要出“安民告示”，写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党我军的宗旨，申明军队保护人民的纪律。红军时期，我军每到一地还打土豪，分田地和财物给老百姓。解放战争时期有“约法八章”布告。这些形式也是对古代军事思想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爱读的《史记》中，就有关于刘邦的汉军每到一地，都要召集父老乡亲进行“抚慰”活动，有时还开仓济贫，深得民众拥护的记载。《三国演义》中也描述了曹操、孙权

和刘备的军队，每攻占一地总少不了要“出榜安民”，申明军队纪律，许诺保护民众利益。他们还常常派士卒和地方官吏将告示的内容“传谕百姓”，以消除民众对军队的疑惧心理，争取民众的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能提出那些卓有成效的宣传群众的办法，正是由于他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善于学习继承古代优秀军事思想遗产。

四、关于瓦解敌军的思想

中国历代的军事家对政治上瓦解敌军的工作都很重视。据《尚书》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就规定了不得虐杀由商朝军队逃来投降的士兵，违者杀头的纪律。⑯到春秋时期，孙武明确提出了通过打击敌军士气，动摇敌将帅信心来瓦解敌军的思想 and 优待俘虏的原则。即所谓：“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⑰“卒善而养之”⑱其后的军事家都很注意运用这两条原则，并在军事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了这两条原则的内容。如汉朝名将韩信在垓下之战中，完成对楚军的“十面包围”后，没有急于发起军事进攻，而是先采取政治攻势，组织士兵大唱楚歌，使项羽的楚军听到“四面楚歌”后，以为家乡都被汉军占领了，勾

起强烈的思乡念亲之情，纷纷开小差。结果，不待汉军总攻，楚军就已土崩瓦解了。三国时，东吴名将吕蒙，袭取蜀国的荆州后，恩恤优待荆州地区随关羽出征的将士的亲属，“按月给粮米，有患病者遣医治疗”。使关羽军将士“皆无斗志”，致使不可一世的关羽败走麦城，被吕蒙生擒砍头。诸葛亮在征讨西南时，七擒七纵西南军事头领孟获，最后终于感化了孟获，使西南军队诚心归附了蜀汉。这些著名事例，都是为历代的史家和军民所称赞传颂的。它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就是政治上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

毛泽东同志把瓦解敌军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提出来，并规定为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综合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他规定的瓦解敌军原则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敌军展开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攻势，如散发传单，战场喊话，通过敌军官兵亲属作工作等；二是对于敌方投诚、反正或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我军的，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安排；三是优待俘虏，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有病者给予医治，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并发给路费。被释放的俘虏如再来，则再捉再放。这些具体内容和形式，也很